

# 克劳迪娅·戈尔丁对劳动力市场性别 差距研究的贡献<sup>\*</sup>

——2023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吴华丽

**摘要:**因在深化理解女性劳动力市场状况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克劳迪娅·戈尔丁荣获 2023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通过创造性地梳理和整合美国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历史数据,戈尔丁首次阐述了美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变迁,以及两百多年性别收入差距的发展过程。她还创建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经济学研究框架,将技术进步、经济转型以及法律和性别文化引入劳动力需求的分析中,将女性的教育、生育、抚育、身份认同纳入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中,解释美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为变化,揭示性别不平等存在的深层原因。戈尔丁不仅系统性地将性别纳入增长和发展的经济学核心议题中,她对女性劳动史的研究也极大地推动了性别经济学的发展。

**关键词:**克劳迪娅·戈尔丁 女性劳动史 女性劳动参与率 性别收入差距 诺贝尔经济学奖

## 一、引言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 2023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女性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在深化理解女性劳动力市场状况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戈尔丁 1946 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67 年获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72 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先后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1971—1973 年)、普林斯顿大学(1973—1985 年)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85—1990 年)。1990 年加盟哈佛大学,成为该校经济系历史上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戈尔丁曾担任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美国经济发展项目主管,现任国民经济研究局经济中的性别项目联合主管。

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相比于男性,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低。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全世界仅有 53% 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而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为 79%。其中,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最大的地区是中东和北非,高达 55%。其次是南亚地区,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为 51%。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一数字通常分布在 10% 至 20% 之间。而女性即使参与了劳动力市场,她们与男性的收入相比也更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在 2020 年全球范围内,女性的收入大约比男性低 20%。值得注意的是,男女收入差距与国家的发达程度关系不大:在高收入国家,男女月收入差距略高于 25%,在中等收入国家约为 20%,在低收入国家则为 28% 左右。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女性在晋升方面的机会较少。例如,根据欧盟公开的数据,在欧盟 27 国的上市公司中,女性担任 CEO 的平均比例低于 10%。

理解以上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性别不平等不仅涉及公平的分配问题,它还是经济发展滞后的表现,同时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首先,在家庭收入更低、基础设施更落后、

<sup>\*</sup> 吴华丽,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智能管理会计研究院,邮政编码:030006,电子邮箱:wuhuali\_econ@gmail.com。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服务业不发达、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女性的教育、劳动生产和健康水平也都更低。例如,在贫困的加纳,由于女性在社区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低于男性,她们的土地更容易被征用,这种情况进一步导致女性在土地应该休耕的时候不愿意放弃土地,从而降低了女性拥有土地的产出(Goldstein & Udry, 2008)。其次,性别不平等会导致全社会范围内个人能力和工作岗位的匹配度下降,降低经济增长潜力。由于性别不平等,女性被排除出可获得高收入的职业和岗位,这会导致女性降低对自身职业发展的期待,致使女性减少对自身教育的投入,这又导致社会人力资本存量随之下降,使得经济增长低于原本可达到的水平。

戈尔丁的研究建立在美国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两百多年历史之上。她拓荒了美国女性就业市场的历史数据,揭开了美国女性在就业、劳动收入和婚姻方面发展的两百年史,发现了新的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并解释了美国女性在这两百年里家庭和就业方面的变化。同时,她专注于美国女性的研究也让人们理解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性别平等的发展上存在差异的原因,为推进性别平等的社会政策指明了方向。

本文将按照历史发生的顺序,分别介绍戈尔丁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和性别收入差距变迁方面的研究贡献。

## 二、以史鉴今:理解女性劳动发展的关键

过去的一百多年欧美国家经历了长期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女性大量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但是在中东、北非和南亚等发展中地区,女性劳动参与率非常低。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发达国家女性的崛起,又是什么阻止了中东和南亚等地区女性的发展呢?理解这些问题离不开历史的视角。

### (一)女性劳动史和经济学的关系

索洛很早就指出,由于现代经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经济学的模型必须是状态相关模型(state contingent model),经济学的目标就是在状态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可靠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以指引政策分析(Solow, 1985)。经济史从历史角度给经济学家提供了更多的观测样本。然而,时间序列分析中一条基本假设是所关注的变量必须具有平稳过程(stationary process)的性质,这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不一致的。虽然社会中的法律体制、风俗文化以及人们的信念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属性,但在长时间内它们不一定一直保持稳定,瘟疫、战争、科技进步、贸易全球化等过程都会使得体制和文化发生巨大的改变。因此,在试图理解这一非常复杂的经济系统时,经济学家必须识别出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临界点和转折点,在相关的社会状态中分析人类的行为。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间,美国经济经历了19世纪初从农业转向制造业的工业革命,20世纪初办公室文职工作的兴起,以及20世纪中期服务业继续扩张。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包含在这些重大的经济结构转型中。在探索女性劳动发展过程中,戈尔丁识别出了女性发展的两个不同的状态: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社会向服务业社会转型。同时,她特别关注在这两种社会状态中各自对应的限制女性就业法律法规的建立与废除,以及在这两个社会状态中社会对已婚女性应不应该外出工作的信念变化。在第一个相关状态里,戈尔丁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现象,即在农业社会向制造业社会转型中,女性劳动参与率整体上保持下降趋势(Goldin, 1990)。她的这一新发现挑战了女性劳动参与是经济发展结果的直觉。

在探索这一新的典型事实过程中,戈尔丁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女性在农业社会中真实的劳动状况,以及她们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法律和社会风俗限制。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已经经历了长达1万多年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仅有两百多年历史,因此许多农业社会中的风俗习惯至今仍深入人心。农业社会的性别劳动分工历史必然对经济结构转型期间女性劳动力状况的改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观察和分析女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状况,不仅需要具备历史知识和视角,还要融入对性别问题的深刻理解。戈尔丁站在了一位拥有这些视角的学者——声名卓越的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的肩膀上。在202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讲演中,戈尔丁感谢博塞

拉普提供了重要理念(big ideas)。博塞拉普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性别相关的理论:在主要使用手持农具如铁锹的游耕农业(shifting agriculture)中,女性是农业社会中的主要劳动力,而在需要先使用犁翻地而后播种的犁耕农业(plough agriculture)中,女性虽然仍然是重要的劳动参与者,但其相对于男性的重要性有所下降(Boserup, 1970)。不过,无论在何种农业社会中,女性群体一直广泛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在阐述她著名的 U 型女性劳动参与率曲线的历史成因时,戈尔丁引用了博塞拉普的著作作为证据,即在农业社会中,女性广泛地在家庭农场和家庭手工业中进行无偿劳动,而社会在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不鼓励女性工作的风俗习惯和限制女性就业的法律(Goldin, 1994)。

其次,理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变化离不开历史的视角,也是因为发展本身变化缓慢。电气设备的扩张、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人力资本的投入等投资发生的时间与这些投资带来收益的时间存在着时间差,仅仅分析短期的社会变化不足以理解深层次动因。例如,美国历经十年大萧条,同时期的人均寿命却增加了 4 年。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是投资时间和收益时间的差异所导致的。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生物医学(biomedical)研究持续进步,城市饮用水设施、污水排放和垃圾处理系统大规模建设,这些投资在大萧条期间持续带来收益(Fogel, 1994)。与此相似的是,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间,经济结构先由农业主导转型为工业主导,再由工业主导转型为服务业主导,包括电气设备在内的技术持续进步,政府主导的义务教育投资持续增加,这些变化同时与法律规定和传统性别观念相互作用,对女性就业市场的影响是渐进的(Goldin, 1990, 2006)。理解女性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化的原因需要从长时间的历史中寻找。

最后,女性劳动的发展依附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深入分析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也会为其他正在经历类似经济转型的国家提供分析依据。比如,当一个国家处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阶段的时候,美国女性这一阶段的发展对于正处在同样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 (二)作为分析基础的女性群体

戈尔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不同出生年份的女性群体(cohort)为分析基础。她区分了不同出生年份的女性群体各自面临的发展机遇和社会限制,并根据女性在生命各阶段做出的不同决策,分析上一代女性的事业和家庭选择以及自身境遇如何深刻地影响下一代年轻女性的教育水平和自我身份认同(Goldin, 2006)。

过去的两百多年中,美国社会的女性主体是已婚女性,只有已婚女性改变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的选择,女性群体的选择才会发生改变。在 19 世纪,女性即使在未婚以前参加工作,但是与其女性前辈们一样,会在结婚以后离开劳动力市场。在大部分已婚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 19 世纪,虽然工业革命带来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选择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但是随着限制已婚女性就业的法律法规的出台,女性群体的劳动参与率还是在下降,同时女性群体也不会改变女性主要责任在于家庭的认知。20 世纪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逐渐提高完全归功于已婚女性开始重回劳动力市场。20 世纪末的年轻一代女性观察到年长女性在婚后重返劳动力市场,于是改变了自身在职场发展上的预期,意识到投资高等教育的价值,最终颠覆了自身对女性身份的认知,完成了“无声的革命”(the quiet revolution)(Goldin, 2006)。

女性在家庭和事业选择上的变化突显于女大学生群体上。在最近出版的《事业还是家庭? 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一书中,戈尔丁详细介绍了在过去一百年间,作为最有机会成就一番事业的五代女大学生们通过观察并总结上一代女性在家庭和职场上的经验教训,不断调整自身对家庭和工作或者职业的安排(Goldin, 2021)。1900—1920 年间的第一代女大学生超过一半没有生育过孩子,她们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二选一,即选择了家庭意味着必须退出事业的追求,而追求事业则意味着放弃组建家庭。1920—1940 年间女大学生一开始与第一代大学生类似,往往选择工作,结婚时间很晚,然而她们遭遇到了大萧条,更严苛的限制已婚女性工作的政策随之而来,于是第二代女大学生们婚后无法再工作,这代人是先工作然后成家,成家以后不工作。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期间的

女大学生们与上一代相反,她们选择了先成家再工作,因为此期间限制已婚女性工作的政策被废除,同时由于服务业的兴起,劳动力需求提高,第三代女大学生们重回劳动力市场。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的第四代女大学生们观察到第三代女大学生的家庭和工作选择,意识到重返工作的困难和晋升空间下降,所以推迟进入婚姻,追求职业的成功,尤其追求在法律、医学、管理等行业获得成功。她们选择了先立业再成家,然而,由于追求职业需要时间且有关生育的医学知识并不普及,因此,很多人错过了生育时间,没有子女的比率非常高。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第五代女大学生们观察到第四代女大学生由于追求事业发展而错过了生育时间,意识到推迟生育的代价,因此选择了事业和家庭兼顾。她们受益于第四代女性开拓的社会空间,开始涌入传统由男性主导的行业。她们依然会很晚结婚,但会同时选择组建家庭和生育孩子,这也与现代的生殖技术比如体外受精等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Goldin, 2021)。

最后,女性群体的分析也揭示了性别平等的改善是漫长的。上一代女性的事业和家庭选择影响下一代女性的教育和就业选择,这意味着年轻女性群体的一系列变化对总体的性别平等产生的影响较小,因此总体上的变化是渐进的。尤其在传统性别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中,宏观上女性群体的变化是缓慢的。

### (三)历史数据的构建

从长时间的历史中去探索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处境和变化,第一个挑战就是数据的缺乏:1890年之前的人口普查没有统计女性的职业。戈尔丁的杰出贡献源自对未经开拓的历史数据的整理。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实际上意味着戈尔丁需要对大量的历史档案进行长期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戈尔丁创造性地收集并整合了企业和城市名录与人口普查的数据,获得了1791—1860年间主要由未婚成年女性和丧偶女性构成的约12000户女性是户主的家庭数据集。丧偶女性有很高的概率接管已故丈夫的生意和收益,因此戈尔丁可以通过这些参与隐形市场工作的女性的工作趋势,来推测美国女性就业率的变化趋势(Goldin, 1986)。

第二个严峻挑战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测量误差。1940年以前美国人口普查将已婚女性的职业记录为妻子。事实上,很多职业被记录为妻子的已婚女性在丈夫的农场工作,在家庭旅馆或者在她们丈夫是小企业主的小作坊里工作。如果只按照美国人口普查中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定义,那么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就会被严重低估,继而女性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和贡献也会被低估。通过整理大量的收入报告、时间使用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戈尔丁才能重新测算1940年之前人口普查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Goldin, 1990)。

戈尔丁对历史数据进行重新梳理并非令人意外之事。她师承罗伯特·福格尔,罗伯特·福格尔一直强调他的老师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教导,经济学的核心统计问题不是随机误差,而是数据的系统性偏差(Fogel, 1993)。在1977年成为第一任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美国经济增长项目主管的时候,福格尔便借助国家资源启动了一系列收集微观数据库的试点项目。福格尔和他领导的团队收集这些数据的目标是理解美国经济和文化如何演变的历史问题,如女性劳动参与率、生育率、死亡率、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移民和社会流动等问题。戈尔丁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于1991—2017年担任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美国经济增长项目主管。到了1993年,美国经济增长项目已经组织整理了自18世纪晚期至今超过50个纵向和横截面数据集(Fogel, 1993)。这也意味着,在经过了十多年的数据收集和整理的团队努力之后,戈尔丁的著作和一系列论文才得以完成。

## 三、两次经济转型中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演变

通过整理自18世纪末开始的美国历史数据,戈尔丁发现在20世纪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百年增长之前,19世纪女性劳动参与率整体上保持下降趋势。这就是著名的U型女性劳动参与率曲线(Goldin, 1990)。本节首先介绍戈尔丁发现的U型曲线下落部分,即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末期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制造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劳动参与率反而在逐步下降的过程。这是一个反直觉

的发现。随后介绍戈尔丁发现的U型曲线上升部分,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劳动参与率逐步增长的过程和原因(Goldin, 2006)。本节还介绍了戈尔丁对U型曲线上升部分中“无声的革命”的研究。在服务业兴起的过程中,已婚女性开始重回劳动力市场,逐渐改变了年轻女性对未来工作前景的期望。恰逢口服避孕药这一发明让年轻的女性们可以控制生育时间,她们终于可以专注学业并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推动了无声的革命(Goldin & Katz, 2002)。

### (一)女性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研究框架

在戈尔丁的研究之前,学术界缺乏研究女性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框架。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不可能从庞杂的历史记录中去真正理解女性的就业(Committee for 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23)。少数经济学家则认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即由于女性劳动力供给弹性较高,因此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工资水平的提高,女性劳动力供给也会提高(Mincer, 1962)。

与此相对,在经典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基础上,戈尔丁建立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研究框架。她将技术进步、经济转型、法律和性别文化的变化纳入劳动力需求的分析中,将女性的教育、生育、抚育、女性身份认同纳入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中,同时分析经济发展和女性面临的家庭制约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从而解释美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行为变化的原因。

劳动力供给是工资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相互作用的结果。教育水平、身份认同、经济转型以及法律和文化对女性就业的限制都通过影响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发生作用。在经典的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供给是工资和休闲时间的方程。如果闲暇是一种正常商品,工资水平提高意味着劳动者收入提高,收入越高人们对正常商品的需求越高,那么工资水平的提高会使得人们提高休闲时间,降低工作时间,因此工资的收入效应意味着提高工资会导致工作时间下降。同时,工资水平提高也意味着不工作导致的损失(闲暇的机会成本)提高,人们会减少休闲时间,提高工作时间,因此工资的替代效应意味着工资水平提高会导致工作时间的上升。工资水平与劳动供给的关系可以是正相关,也可以是负相关,这取决于(正的)替代效应和(负的)收入效应的大小。

在解释U型女性劳动参与率曲线的时候,下降部分是工资的收入效应占主导。一方面,制造业带来的家庭高收入让女性可以享受更多的闲暇;另一方面,法律或者社会风俗限制女性就业,负的收入效应上升。U型曲线的上升部分是工资的替代效应占主导,一方面,服务业带来的高收入让闲暇的机会成本更高,女性选择工作更长时间;另一方面,法律和社会风俗的限制下降,负的收入效应下降。

### (二)从农业社会向制造业社会转型:U型曲线的下降部分

了解19世纪女性劳动发展过程的第一个挑战是数据的缺乏。因为1890年之前的人口普查没有统计女性的职业,女性劳动参与被低估的问题非常严峻。尽管如此,通过创造性地整合时间使用调查、产业统计和普查数据,戈尔丁统计了19世纪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通过整合费城的企业和城市名录与费城的人口普查数据,戈尔丁获得了1791—1860年间主要由未婚成年女性和丧偶女性构成的约12000户女性是户主的家庭数据集,占费城家庭总样本的15%。其中一个关键的发现是,这些名录中44%的女性被记录的职业主要集中于一些可以在家中完成的工作,例如经营旅馆,或者从事洗衣工作等。尤其重要的是,戈尔丁跟踪了费城丧偶女性的工作经历,发现了这些18世纪90年代期间的丧偶女性有很高的概率接管已故丈夫的生意,这证实了已婚女性参与隐形市场工作(hidden market work)的现象。戈尔丁发现这些隐形市场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看店或者经营旅馆,还包括一些不太传统的职业,比如制鞋、售卖五金产品以及生产锡制品。并且,这些女性为户主的家庭占比在19世纪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表明已婚女性参与隐形的趋势是下降的(Goldin, 1986)。

在农业向制造业转型期间,虽然工厂的涌现和小企业主数量的衰减导致已婚女性在整个19世纪中的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但是与此同时的年轻单身女性是另一个景象(Goldin, 1986)。已婚女性需要同时考虑市场机会和家庭责任,选择在婚后离开劳动力市场,而年轻的单身女性则可以专注

于工业化带来的机会。由于相对于在农场上劳作获得的收入,工厂的薪酬更高,对于年轻的单身女性而言,工资的替代效应远远大于收入效应。十九世纪早期开始的美国工业革命大幅度提高了年轻单身女性的就业率。起步于美国东北部的工业革命使得当地的年轻女性就业率在 1832 年达到 37% (Goldin & Sokoloff, 1982)。无论哪个州开始工业化进程,该州的年轻未婚女性在制造业中的就业率都会上升。例如,在马萨诸塞州,1832 年 10 岁至 29 岁的女性就业率是 27.1%,1837 年则上升到 40%。由于女性同时在服务业中工作,而女性在服务业中的就业率通常会高于制造业,因此预估的 1837 年单身女性的就业率会高于 40%。尽管如此,1850 年以后年轻单身女性在制造业中的就业率开始下降,因为当时的人们开始质疑女性的就业权利,开始推行限制女性就业的法律条例(Goldin, 1990)。

在整个 19 世纪的美国,已婚女性外出工作是一种社会耻辱,女性结婚以后就会离开就业市场。此外,虽然随着工业革命在整个美国扩张,年轻未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度提高,但是限制甚至禁止女性就业的法律壁垒毫不意外地紧随其后,打击了年轻未婚女性参与劳动的上升势头。法律壁垒与限制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社会风俗共同作用,使得整个 19 世纪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Goldin, 1986)。

此外,了解 19 世纪女性劳动发展过程的第二个挑战是人口普查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定义有误,因为 1940 年之前美国人口普查将已婚女性的职业记录为妻子。通过整理收入报告、时间使用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戈尔丁重新测算了 1940 年之前人口普查中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Goldin, 1990)。对农业部门的女性劳动力重新测算后,1890 年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 7%;对家庭旅馆行业以及制造业中女性劳动力重新测算后,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 3%。被低估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几乎都来源于白人已婚女性群体:经过戈尔丁重新测算的白人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 12.5%,而官方人口普查只有 2.5%。重新测算以后的 1890 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从 19% 提高到 26%,与 1940 年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类似(Goldin, 1990)。这一发现也进一步验证了,1890—1940 年间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呈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形状。

### (三)从制造业社会向服务业社会转型:已婚女性回归劳动力市场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原因

20 世纪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尤其是白人已婚女性,重新加入劳动力市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1890—1970 年间 89% 的人口是白人;其二,1900 年黑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远远高于白人女性。戈尔丁认为黑人已婚女性和白人已婚女性的就业差异与奴隶制有关,奴隶制历史使得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黑人已婚女性更少地被污名化(Goldin, 1977)。

1900 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为 21%,其中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 6%。与此对比,1980 年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都为 50%。尽管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保持上升趋势,但是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大多已婚女性在婚后都会离开就业市场。对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戈尔丁的解释是,女性婚后离开就业市场的这个历史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变化的是已婚女性开始在婚后重新加入就业市场(Goldin, 1990)。

已婚女性重返劳动力市场表明,在 20 世纪不同年龄段出生的白人女性在人生不同阶段做出了不同的就业选择。例如,对于 1886—1895 年间出生的白人女性,她们在 50 岁时的劳动参与率不到 10%,而对于 1926—1935 年间出生的白人女性,她们在 50 岁时的劳动参与率已经超过了 50%(Goldin, 1990)。

### (四)服务业转型期:女性劳动参与率由低到高的上升趋势

1890—1930 年间白领工作的兴起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不大。20 世纪初电气技术的进步使得办公室文职工作变得流程化,同时企业对诸如打字员、速记员、现金收纳这类辅助管理的职位需要也提高了。相对于制造业的工作,办公室工作更干净体面,女性面临的就业羞辱更少,原来在制造业工作的女性倾向于转移到白领行业,因而总体上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不大(Goldin, 1984)。与此同时,美国 1910 年开始推进的“高中运动”也使得拥有高中学历的女性超过了男性。当时教育投资对

女性的收益更高,因为没有学位女性很难找到工作,而男性没有学位还可以找到报酬颇丰的体力工作。因此,政府推动的高中义务教育投资支撑了女性从制造业转移到办公室工作(Goldin,1998; Goldin & Katz,2008)。高中运动不仅提高了女性接受教育的年限,还由于对教师的需求上升,进一步提高了女性就业率。在此期间,白领办公室工作岗位由早期的男性占主导变成了女性占主导。

在白领工作的兴起期间,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不大这一现象也与限制女性就业的法律条款有关。从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就推行了禁止雇佣已婚女性的法律法规,即所谓的婚姻限制(marriage bar)。婚姻限制在20世纪初有增无减,在大萧条期间达到巅峰(Goldin,1990,2021)。

与早期白领工作兴起阶段相反,在1930—1980年间的服务业扩张时期,女性劳动参与率稳步上升,虽然男女收入差距的变化并不大。女性劳动参与率稳步上升最直接的原因是婚姻限制在20世纪40年代被废除(Goldin,1990,2021)。婚姻限制被废除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企业需要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女性渴望进入劳动力市场。二战期间,美国男性被动员参战,劳动力短缺,企业需要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此期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尤其是接受过高中教育或拥有更高学历的已婚女性,会更多地留在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市场上有大量曾经有过白领工作经验的已婚女性,她们的孩子已经长大,她们渴望回到劳动力市场。回归劳动力市场的渴望也被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等现代家用电器的普及所增强。

除了婚姻限制被废除以外,这一时期社会对已婚女性进入职场这件事的接受度上升了。在研究20世纪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时,费尔南德斯发现,到20世纪后期,人们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对女性外出工作的信念(Fernández,2013)。在“你是否支持这样一种情况,即已婚女性的丈夫完全有能力养活她,但她仍选择外出挣钱”这个问题上,20世纪40年代只有20%左右的人选择支持,而到了1980年已经有接近80%的人表示支持。人们对女性外出工作变得更加包容,这意味着收入效应的负面作用开始下降。此外,随着观念的改变,企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兼职岗位,以便于已婚女性能够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例如,1940年女性劳动力中只有18%参与兼职岗位,这一数字在1960年上升到28%(Goldin,1990)。

### (五)无声的革命:自我期望的转变和口服避孕药

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女大学生数量开始超过男大学生,而且开始涌入传统上是男性为主的大学专业,比如医学、法律、工商管理、经济学等。女性人力资本的迅速提高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男女收入差距。尽管这一阶段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不到20%,远低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约30%的幅度(已婚女性则增加了约40%),但这个阶段被戈尔丁称为革命阶段,即所谓的无声的革命(Goldin,2006)。这是因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女性的自我期望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她们开始展现锐意进取的决心,涌入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行业和职业,追求事业上的成功。

对教育年限、结婚年龄、生育数量和就业与否等的期望往往在个人年轻时就已经形成。教育决策与教育能够带来的收益密切相关,因此教育决策与未来的就业前景紧密相关。通过观察女性前辈们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和处境,年轻女性据此估计自己未来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处境,继而决定当下的教育决策。

20世纪70年代末期,年轻女性的就业期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美国国家追踪调查的统计,1958/1959年出生的女性预计35岁时还在就业市场上的比例为80%,而1947/1948年出生的女性则预计35岁时还在就业市场上的比例仅为35%(Goldin,2006)。1958/1959年出生的女性的预计相对正确(实际为75%),而1947/1948年出生的女性预计错误(实际为65%)。就业前景预计的不同意味着高等教育带来的收益也不同。1958/1959年出生的女性(70年代末上大学)在高中时期就更多地为上大学做准备。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女大学生比率超过男性,且这个比率差还在上升(Goldin et al,2006)。女大学生不仅开始在数量和占比上超过男大学生,她们也逐渐进入医学、法律和工商管理等事业导向型专业。她们不再只是追求有一份工作,而是追求有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自1980年起,在美国大学生群体中,将家庭的成功当成是人生成功的标准不再具有男女差异

(Goldin, 2006)。与男性一样,年轻的女性们开始将得到同事的认可、获得可观的财富作为成功的标准。在这一阶段,工资的替代收入效应超过了工资的收入效应。她们相对于男性的收入也开始提高。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初,美国女性收入占男性收入比率从60%左右上升到75%左右(Goldin, 2006),而2018年该比率已经超过80%(Goldin, 2021)。

这场无声的革命是由口服避孕药所推动的。在口服避孕药存在之前,堕胎不合法、不安全甚至被污名化,因此怀孕意味着需要结婚和生育,也意味着中断学业。口服避孕药的出现和普及降低了延迟结婚的成本,也帮助女大学生控制生育时间,使她们专注学业,完成高等教育(Goldin & Katz, 2002)。如果没有口服避孕药,即使女性改变了工作和教育的预期,她们还是会因为怀孕而中断学业,或者为了追求学业和事业放弃组建家庭生育子女。

口服避孕药在1960年就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但是只被允许已婚女性使用,且需凭处方购买。医生在为未成年女性开具口服避孕药前必须获得父母的同意。当时美国法定成年年龄一般是21岁。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法定成年年龄由21岁下调到18岁,因此能够使用口服避孕药的女性变多。几乎在同时期,许多州放宽了未成年女性使用避孕药必须得到父母同意的限制。因为法定成年年龄下调到18岁,大学校园也可以合法地给大学生们提供避孕节育的服务和避孕建议。使用回溯调查问卷统计人们第一次使用口服避孕药的时间,戈尔丁和卡茨发现,避孕药使用数量的上升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法定成年年龄的下调及放宽避孕药的使用需父母同意的规定紧密相关(Goldin & Katz, 2002)。他们进一步证实,避孕药的使用提高了初婚年龄和第一次生育的年龄,也提高了事业导向型职业(这些专业需要前期大量时间投入)的教育投资。值得一提的是,各州下调年龄的动机源自越南战争的征兵需要,因此法定成年年龄下调对使用避孕药数量的改变完全是外生的冲击。

#### 四、两次经济转型中性别收入差距的变迁

通过整理美国农业和制造业的收入数据,戈尔丁展现了美国性别收入差距在两百年间逐渐缩小的过程。自19世纪早期的农业社会中,美国女性收入占男性收入约为30%,工业革命之后这一比值提高到48%左右。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后期服务业扩张期间,性别收入差距变化缓慢,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1960年这一数值只上升到55%左右。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无声的革命则带来了性别收入差距的迅速缩小。但是1990年以来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即高学历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超过了低学历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对此,戈尔丁发现同一职业内的收入差距在解释性别收入差距中越发重要,并进一步探索同一职业内男女收入差距的来源。

##### (一)从农业社会向制造业社会转型:男女收入差距逐年缩小

由于美国直到20世纪中期才开始收集有关收入的数据,因此戈尔丁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整理主要来自制造业的收入数据,呈现美国两百年来男女收入差距变化的全貌(Goldin, 1990)。在美国工业革命(1820—1850年)以及白领服务业兴起期间(1890—1930年),美国男女收入差距在逐渐缩小:1820年美国女性收入只占美国男性收入的30%左右,1850年提高到48%左右,1920年约为50%。这百年内男女收入差距的缩小发生在同工同酬的社会运动之前,其变化主要来自经济增长过程中女性获得的新的就业机会。

19世纪末期的男女收入差距主要源于性别隔离,女性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鞋帽和食品罐头等门槛低且上升空间有限的行业。在这一时期,由于制造业主要采用计件工资制度,工人获得的收入与其生产产品的数量直接挂钩,因此性别歧视导致的男女收入差距效应并不十分明显(Goldin, 1990)。由于女性在农业中进行了大量无偿劳动,因此她们获得的收入远远低于男性,工业革命带来的就业机会大大提高了女性收入,进而缩小了男女收入差距:到1850年男女收入差距已经缩小到50%,接近1950年的水平(Goldin & Sokoloff, 1982)。需要注意的是,男女收入差距不是比较社会中所有的男性和女性。在计算男女收入差距的时候,只会将参与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的男性和女性进行比较。

即使一个社会中大部分女性并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男女收入差距的计算也只会拿工作占比很小的女性群体与工作的男性进行比较。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在这个转型期间女性劳动参与率存在下降的趋势。即使男女收入差距在缩小,但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占比是下降的。

## (二)从制造业社会向服务业社会转型:男女收入差距变化缓慢

虽然美国社会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比如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幅度提升,女性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美国男女收入差距缩小的进程非常缓慢。在1880—1960年间长达80年时间内,制造业中女性收入占男性收入比率保持在55%左右。同时期包含了所有职业的女性收入占男性收入比率只在1890—1930年间缓慢上升,随后的30年间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

当白领工作开始扩张时,薪酬制度从计件工资转变成长期的合约工资,合约工资是对工人根据工作内容在一定时间内支付的报酬,给性别歧视打开了空间。性别歧视导致的男女收入差距在服务业兴起的过程中开始增加。到了1940年,绝大部分的男女收入差距无法被与个人生产率有关的因素(比如教育和工作经验)解释。随着20世纪中叶企业人力部门的建立,职位层级和工资制度开始出现。由于女性通常花更少的时间在工作上,晋升空间受限,更容易处于职位层级的低端,因此在解释男女收入差距的原因中,一个越发重要的解释因素是同一职业内(within occupations)的工作层级差距(Goldin, 2014)。

服务业扩张期间,男女收入差距变化不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普遍比男性低。对在1930—1980年间参加劳动力市场的女性而言,由于她们的女性前辈通常没有长期就业,因此这些女性在年轻时做出的教育投资决策低估了高等教育对她们实际收入的重要性,相比男性更少上大学。这些女性原本以为自己在婚后会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事实上却在人生大部分时间参与了劳动力市场。她们重回劳动力市场时困难重重,职业晋升空间有限,给更年轻一代的女性敲响警钟。据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年轻女性改变了预期,开启了一场无声的革命。在无声的革命期间,随着女性大规模涌入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行业后,男女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女性占男性收入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60%,迅速地提高到2000年的73%左右,并在2020年超过了80%(Goldin, 2021)。

## (三)服务业社会出现的新现象:高受教育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更大

1990年以来,呈上升趋势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开始保持稳定,虽然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女性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但是相对于男性,女性劳动参与率继续上升的空间已经不大。与此同时,男女收入差距则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新现象:在所有工人中,女性全职工人年收入的中位数相对男性收入的比率一直稳步上升,在2018年已经超过80%;在大学毕业工人中,女性全职工人年收入占男性全职工人年收入的比率自1990年以后就一直保持平稳,保持在70%左右;在大学毕业的工人中,对于所有1958—1978年间出生的群体,女性收入占男性收入的比率都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Goldin, 2021)。理解男女收入差距,尤其是高学历群体的男女收入差距,是戈尔丁对这一阶段的研究重心。

1. 职业内的收入差距。自1980年以来,男女收入差距迅速缩小。那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男女收入差距的大小和变化呢?对此通常有三个解释:教育水平的差距,职业间的收入差距,以及职业内的收入差距。戈尔丁的研究表明,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性别收入不平等主要源自男女在同一职业内的收入差距,而不是男女教育水平的差距,也不是男女在不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Goldin, 2014)。

通过经典的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布劳和卡恩发现,教育能解释的美国男女收入差距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2.6%下降到2010年的-5.9%,即在2010年教育年限不仅不能解释男女收入差距,它甚至反过来缩小美国男女收入差距(Blau & Kahn, 2017)。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生的美国女性在参加大学教育的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男性,且越年轻的一代,女大学生的数量比男性更多(Goldin, 2006)。教育年限的性别差距已经不是男女收入差距的原因。

虽然教育年限对美国的性别收入差距影响不再重要,但是大学专业的选择和随之而来的具体职业选择依然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男女收入差距。例如,布劳和卡恩发现,在2010年的美国,行业和职业选择可以解释略超过一半的性别收入差距(Blau & Kahn, 2017)。在大学专业的选择上,男性和

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简称 STEM)领域差异最大,而 STEM 领域的职业收入水平通常更高(Bertrand, 2020)。例如,2014 年欧盟女性只占薪酬最高的 STEM 职业的 14%。

尽管如此,戈尔丁指出,尽管大学专业和职业选择依然在影响性别收入差距,但是对于美国大学毕业生群体而言,性别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是同一职业中的收入差距,而不是不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Goldin, 2014)。不同于布劳和卡恩(Blau & Kahn, 2017)使用 Blinder-Oaxaca 分解方法,戈尔丁比较了以下两种情况下男女收入差距的变化:第一,同一种职业中,男性和女性收入相同;第二,男性和女性平均分布在所有的职业中。戈尔丁发现,如果男性和女性在同一种职业中能够获得同样的收入,那么性别收入差距将会缩小约 2/3。相比之下,如果男性和女性平均分布在不同职业中,性别收入差距只会缩小约 1/3(Goldin, 2014)。戈尔丁的这一发现强调了理解职业内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她之后进行的研究涉及“随叫随到”的母职惩罚以及工作时间弹性、贪婪的工作,这些研究都是在回应这一发现。

2. 母职惩罚。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美国低学历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保持稳定,而大学毕业生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Goldin et al, 2017)。在美国女大学生占比已经超过男大学生的情况下,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反常的现象? 戈尔丁及其合作者发现,女性成为母亲以后会在职场上遭遇各种负面影响,即“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可以解释很大部分的性别收入差距(Bertrand, Goldin & Katz, 2010)。

通过研究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 1990 年至 2006 年男女 MBA 毕业生职业发展路径,戈尔丁等探索了男女收入差距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变化(Bertrand, Goldin & Katz, 2010)。研究发现,这些 MBA 刚毕业的时候,男女收入几乎没有差距,而毕业 13 年以后,女性的收入只有男性的 64%。事实上,随着毕业的时间延长,女性在工作时间和请假时间上逐渐比男性高。毕业 10 年以后,男性没有工作的时间只有 0.12 年,而女性为 1.05 年。如果假设女性 MBA 与男性 MBA 每周有相同的工作时间,那么女性 MBA 的收入上升为男性 MBA 的 73%,如果再假设休假时间也相同,那么女性的收入会上升到男性的 91%。与此同时,女性 MBA 发生过职业中断(半年或者以上时间没有过工作)的可能性比男性高 22%。毕业 9 年以后,有 13% 的女性 MBA 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而只有 1% 的男性 MBA 退出劳动力市场。

那么自然而然的问题是,为什么相对于男性,女性的工作时间会逐渐减少? 同样重要的是,为什么女性 MBA 出现职业中断的可能性更高? 戈尔丁等发现,请假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男女差异并不是随机出现的,它随着女性 MBA 有了孩子而出现(Bertrand, Goldin & Katz, 2010)。生育以及养育子女是导致女性 MBA 工作时间减少和请假增多的主要原因。如果女性 MBA 的配偶收入较高,母职惩罚效应更为显著。与有孩子的女性 MBA 不同,没有生育孩子的女性 MBA 在 13 年以后与男性 MBA 的收入差距没什么变化。工作时间短一点当然意味着收入更低,但是这些 MBA 大多在大公司、咨询和金融领域工作,即使工作时间只是相对少一些,也意味着收入上升空间迅速减小。对这类需要长期晚上加班、周末随时待命但高薪的工作,戈尔丁随后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3. 贪婪的工作。为什么抚育小孩的职业惩罚只发生在女性身上? 实际上,女性确实承担了大部分的抚育责任。那么,除了天然因素外,还有什么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承担了大部分育儿责任呢?

戈尔丁和卡茨认为工作岗位缺乏灵活性是母职惩罚的一个重要原因。工资和工作时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即并非随着每月(周)工作时间增加一倍,月(周)收入也增加一倍。在工作时间超出一个临界点以后,额外工作的时间会得到数量可观的额外奖励。对这类需要晚上加班、周末随时待命但高薪的超长工作岗位,他们创造了一个术语:“贪婪的工作”(greedy jobs)(Goldin & Katz, 2011)。

虽然在没有孩子之前,异性夫妇双方都可以选择贪婪的工作,但是一旦有了孩子,夫妇中就需要至少一位家长随时待命,以应付孩子生病受伤等突发事件。由于贪婪的工作缺乏时间的灵活性,选

择随时待命的家长不能从事贪婪的工作。平摊育儿责任意味着夫妇双方都选择时间灵活但收入更低的工作。如果不平摊育儿责任,一方选择时间灵活的工作,另一方选择贪婪的工作,那么这对夫妇的家庭总收入会提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妇们会倾向于第二种方法,从养儿育女角度,通常是女方选择灵活的岗位,男方选择高薪的“贪婪的工作”,也导致了男女收入差距扩大(Goldin & Katz, 2011)。

戈尔丁发现,性别收入差距在具有以下特征的职业中更高:工作中有着大量严格的截止日期;需要经常与人联系;需要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工作流程固化;需要经常做决定。这 5 个特征都可以从美国劳工部对涵盖整个美国经济 1000 个职业构建的职业信息网络 O\*NET 中得到。这些特征意味着这些职位很难被人替代,必须随叫随到,缺乏工作时间弹性(Goldin, 2014)。高薪与否与这些特征并不直接挂钩,即高薪的职业也可以具有较高的时间弹性。对此戈尔丁提供了一个例子,即需要长期人力资本投入、收入也很高的药剂师职业。由于药品变得越来越标准,多数时候不需要专门配方,同时药剂师可以通过医疗信息技术直接获得顾客的处方信息,可以直接给顾客提供建议和出售药品。由于药剂师不再需要与特定的顾客绑定,因此不同药剂师之间的工作很容易相互替代,所以他们不用担心家庭发生突发情况时工作没人替代,可以有规律地工作和生活。目前女药剂师的收入中位数是男药剂师的 94%(Goldin, 2021)。

戈尔丁强调了贪婪的工作在男女收入差距中的作用,并称解决贪婪的工作带来的挑战是性别收入平等的最后一章(Goldin, 2014)。即使如此,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文化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依然不可被排除。例如,贝特兰论述了性别刻板印象可以解释为什么更多是女性选择暂停或者减少工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育儿上。一些文献认为,性别刻板印象并不一定准确地概括了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和能力,例如可能高估了男女在理解并感受他人情绪和体验、并对他人境况表达关心的所谓共情能力(social sensitivity)的本质差异,即女性的“共情能力”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高(Bertrand, 2020)。

## 五、全球政策影响

戈尔丁对美国女性劳动史的研究为政策建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时间线长达两百多年的 U 型女性劳动参与率曲线的基础上,戈尔丁深入挖掘了一系列影响女性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1)经济转型,即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型到服务业为主的社会;(2)科技进步,包括改变办公环境的电气设备,家用电器的发明和普及,口服避孕药的发明;(3)接受教育的机会;(4)性别文化的改善,以及女性对未来的自我期望;(5)限制女性就业的法律被废除。这些因素都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

与美国一样,其他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也是 U 型,这些国家目前性别收入差距也主要源自母职惩罚。戈尔丁对母职惩罚的研究正在引领当前一系列对发达国家家庭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的研究。对此,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些政策是否能够缩小男女收入差距;其次,如果有效,那么这些政策效果有多大。具体而言,这些家庭政策包括给予母亲的带薪或无薪产假,给予父亲的带薪或无薪产假,同时给予母亲和父亲的产假,以及公共育儿政策。通过梳理发达国家家庭政策效果的文献,奥利韦蒂和彼得罗戈洛发现产假政策对女性劳动就业率的影响在各个国家并不一致。总体来说,短期产假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有正面影响,而长期产假政策则可能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产假有益于技能低的女性的就业和收入,而对技能高的女性则有不利的影 响。相比之下,对早期儿童进行支持的育儿政策会显著地降低男女收入差距(Olivetti & Petrongolo, 2017)。因此,相比于产假政策,那些使得育儿女性工作更便捷的政策在改善男女不平等方面更为关键。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育儿政策在性别文化更传统的国家效果更明显。由于产假并未改变母亲作为一个随叫随到的家长角色,因此有效的家庭政策必须是那些使得有孩子的母亲能够便捷工作的政策,比如公共育儿政策。这个现象凸显了在改善发达国家性别收入不平等现象中,转变“母亲是随叫随到的家长”

这一性别文化的重要性。

通过对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戈尔德丁的研究也让人们理解了当前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中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和挑战。在美国女性两百年的劳动力市场历史中,这些因素的影响是有阶段性的。发展中国家想要改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首先要识别出是哪些因素最为关键,然后在关键的因素上施加政策。

首先,当经济处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阶段时,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同时存在的认为已婚女性外出工作是伤风败俗的性别文化,以及限制甚至禁止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法规,都会使得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即使经济转型过程中明显已经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Goldin, 1990)。因此,对于处于这一转变的发展中国家,尤其要通过法律法规去降低传统性别文化带来的影响。其次,当经济处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的阶段时,教育变得非常重要,同时女性能够控制生育时间也变得非常重要。这些国家尤其应该加大对女性教育的投资,并提供安全便捷的避孕服务。在这个阶段,性别文化和法律法规依然决定了教育和避孕控制能力能发挥的作用大小。在存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政府仅仅只提高女性教育和给女性提供避孕措施服务,那么女性就业的提高依然会相对有限。这些国家需要格外地给女性赋权,例如公开树立和推崇成功职业女性作为榜样,禁止在劳动力市场上歧视女性,并提供公共育儿服务。

以中国和印度为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两国的GDP都保持稳步增长。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1%,印度为24%。印度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低并非因为印度女性的教育水平低于印度男性。事实上,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印度在教育上的性别差距几乎不存在,而中国的教育性别差距则略高于印度。根据戈尔德丁的研究,印度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更多地与不鼓励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文化有关。因此,要提高印度女性的就业率,需要针对其传统的社会文化和市场歧视方面实行相应的政策。相比之下,由于经过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社会已经比较认可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因此,在缩小男女就业和收入差距方面,中国需要更多地加强法律措施,禁止性别歧视,同时为有孩子的工作女性提供高质量且低成本的公共育儿服务,以减少育儿责任对她们职业发展的限制。

## 六、简评

本节主要从两个角度对戈尔德丁的贡献进行简评:第一,戈尔德丁的研究继承和发展了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议题,即增长和发展;第二,戈尔德丁推动性别经济学(economics of gender)走向了经济学的主流。

首先,戈尔德丁系统性地将性别纳入增长和发展的经济学核心议题。库兹涅茨曾指出,技术进步必须要有相适宜的体制和社会观念的支持,否则经济不会增长(Kuznets, 1973)。例如,假设社会存在大量的文盲或者社会是奴隶制,抑或是社会主流保持着农村的生活状态和家庭模式,蒸汽机、电力和大型工厂并不会引起经济增长。戈尔德丁继承了她的“智识师祖”库兹涅茨(Goldin, 2021)的理念,第一次将科技发展,比如蒸汽机引起的工业革命,以及电气化导致的服务业兴起,与性别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性别观念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她的研究突出了在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型中,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发展机会的同时又在家庭责任上获得解放(或因为家庭责任而失去市场机会),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促进了经济增长。

在由蒸汽机发明和应用所引发的工业革命中,家庭小作坊被机械化大工厂取代,美国女性原本在农业社会中存在的隐形市场被压缩了。美国社会存在的已婚女性主要责任在家庭的观念,也会在制造业提供给女性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促成政府出台一些名义上保护女性、实则限制女性的措施,将女性驱逐出经济增长中的市场机会。通过创造性地整理历史数据,戈尔德丁证实了库兹涅茨的增长理论,即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与性别相关的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是相适应的,但对女性来说,这些变化不见得有益(比如颁布限制女性就业的法规)。

随着电气化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期间成长起来的大企业开始全面使用电力设备建设工厂和办公室,给服务业的兴起打下基础。电气化带来的家用电器也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了美国普通家庭,使得美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在电气化过程中,劳动力市场需要女性作为劳动力加入生产过程中。在新一次的经济结构转型中,女性群体发生了与之前不一样的变化。

虽然技术进步必须要有相适宜的体制和社会观念支持,但同时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会使得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则会引起社会观念发生缓慢的变化(Kuznets, 1973)。经济转型意味着不同生产部门中工作人口比例发生改变。由于经济参与会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因此经济转型意味着社会中个人生活方式的转变。具体而言,经济结构中原本占比最大的部门在转型后相对变小,这些部门的工人的生活方式在转型后对外界的影响力会变小;相反,经济结构中原本占比较小的部门在转型后占比相对提高,其工人的生活方式对外界产生的影响力会变大。蒸汽机和电的发明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身处其中的女性逐渐改变了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选择,间接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即她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或选择外出工作),继而人们也保持(或改变)对女性婚后可以外出工作的信念。

例如,20世纪初的高中运动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同时电气化带来的白领工作相比于体力工作更为体面,这给女性长期留在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比工业社会更大的社会空间。女性婚后应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社会观念逐渐松动,限制已婚女性工作的法律被逐步废除,女性从而一步步巩固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发展机会。此外,女性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中有一部分选择了事业,却终生没有结婚生育。美国大部分人逐渐认为,即使已婚女性的丈夫完全有能力养活她,她也可以选择外出挣钱。

戈尔德丁描绘出美国女性两百多年的经济发展史,激励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将占人口一半的女性纳入研究和理解本国的经济发展中。虽然戈尔德丁对美国女性发展史的研究对别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她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套到别的问题上。这是因为即使一个技术在一个国家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被了解,但是在另一个国家应用时,它对另一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可预见的:这个技术正在与一个它没有作用过的社会体制和观念相结合(Kuznets, 1973)。例如,与宗教力量强大的中东地区相比,经过了社会主义洗礼的中国社会对女性外出工作的信念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电气化带来的服务业的崛起,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以及对女性的发展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

其次,戈尔德丁的研究不仅继承了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议题,在性别经济学走向主流经济学的过程中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研究劳动力供给和收入的时候,由于家庭(尤其是生育和育儿)的作用位于核心,性别变成不可忽略的因素。经济学界主流不再认为个人时间的使用只有休闲和劳动时间,家务劳动、育儿和照顾老人等行为都被纳入个人的家庭生产函数中,夫妻之间所谓的讨价还价和博弈方式都成为研究的核心议题,家庭经济学(family economics)随之发展。

由于性别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基本视角之一,因此随着戈尔德丁开拓了女性劳动历史的研究,性别视角的研究开始超越劳动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的范畴,向经济学各个研究领域扩展。例如,在职场上女性收入相较于男性低,是不是因为女性不擅长或者不喜欢与男性竞争,抑或者由于性别歧视,女性在团队工作中得不到认可?男女不平等的现象难以改善,是不是因为从农业社会继承过来的根深蒂固的性别文化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改变?还是因为法律体系本身就会影响到性别平等进程,比如相较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在保护女性财产上力度更弱,继而导致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除了推动性别视角下个人行为的经济学研究,戈尔德丁的研究还凸显了研究传统性别文化的重要性。首先,无声的革命在年轻女性改变性别身份认同中发生,性别身份的认知变化值得重视。其次,母职惩罚和父职奖励现象是解释发达国家中高学历群体性别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而母职惩罚存在的前提在于传统的性别文化。随着经济学中有关性别的研究大量涌现,进一步深入理解性别文化和性别刻板印象如何形成和如何改变是自然而然的。

在性别相关的论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经济学国际权威期刊的情况下,研究文化和体制的经济学家

们开始研究性别文化的形成与演化。在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拉克尔·费尔南德斯(Raquel Fernández)引入流行病方法(epidemiological approach)推动文化经济学领域的实证研究发展以前,文化经济学的主要实证研究对象包括信任、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家庭联系、宗教观念、对分配的态度等,很少关注性别文化。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济学领域逐渐出现了一批研究性别文化的实证研究,探索性别文化形成的原因,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农业社会的形成、农业技术(如是否使用犁)、土壤禀赋、适宜灌溉的地理环境、语言的性别语法结构、政治体制、战争等历史因素。

经过性别相关研究的多年积累,目前性别经济学在教学和就业市场上也呈现上升趋势。实验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穆里尔·尼德勒(Muriel Niederle)和劳动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亚历山德拉·维埃娜(Alessandra Voena)2022年专门在斯坦福大学给经济学博士生们开设了性别经济学的课程。2023年巴黎经济学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开设了性别经济学的暑期课程,吸引了大量在欧洲求学的经济学博士生参与。在当下经济学国际招聘市场上,诸如博科尼大学经济系、日内瓦大学经济系等开始招聘专门做性别经济学研究的教授。在戈尔德丁四十多年对女性史的开拓中,在她目前作为NBER的性别项目主管继续推动性别研究问题的过程中,性别经济学正在继续稳步发展。

#### 参考文献:

- Bertrand, M. (2020), "Gend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10:1-24.
- Bertrand, M. et al. (2010), "Dynamics of the gender gap for young professionals in the financial and corporate sector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3):228-255.
- Blau, F. D. & L. M. Kahn(2017), "The gender wage gap: Extent, trends, and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5(3):789-865.
- Boserup, E. (1970), *Woma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Committee for 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2023), "To Claudia Goldin: For having advanced our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labor market outcomes", <https://www.nobelprize.org/uploads/2023/10/advanced-economicsciencesprize2023.pdf>.
- Fernández, R. (2013), "Cultural change as learning: The evolution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ver a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1):472-500.
- Fogel, R. W. (1993), "Robert W. Fogel biographical",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economic-sciences/1993/fogel/biographical/>.
- Fogel, R. W. (1994),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theory, and physiology: The bearing of long-term processes on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No. 4638.
- Goldin, C. (1977),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The origin of black and white differences, 1870 and 188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1):87-108.
- Goldin, C. (1984),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female earnings functions and occupation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1):1-27.
- Goldin, C. (1986), "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in the early Republic: Quantitative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6(3):375-404.
- Goldin, C. (1990),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in, C. (1994), "The U-shaped female labor force func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4704.
- Goldin, C. (1998), "America's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 The evolution and spread of secondary school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2):345-374.
- Goldin, C. (2006), "The quiet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women's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fami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1-21.
- Goldin, C. (2014), "A grand gender convergence: Its last chapt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4):1091-1119.
- Goldin, C. (2021), *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ldin, C. & L. F. Katz(2002), "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4):730-770.

- Goldin, C. & L. F. Katz(2008), “Transitions: Career and family life cycles of the educational eli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2):363—369.
- Goldin, C. & L. F. Katz(2011), “The cost of workplace flexibility for high-powered professional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38(1):45—67.
- Goldin, C. & C. Olivetti(2013), “Shocking labor supply: A reassessment of the role of World War II on women’s labor sup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3):257—262.
- Goldin, C. & K. Sokoloff(1982), “Women, childr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Evidence from the manufacturing census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2(4):741—774.
- Goldstein, M. & C. Udry(2008), “The profits of power: Land rights and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Gha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6):981—1022.
- Goldin, C. et al(2006), “The homecoming of American college women: The reversal of the college gender gap”,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4):133—156.
- Goldin, C. et al(2017), “The expanding gender earnings gap: Evidence from the LEHD—2000 Cens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5):110—114.
- Kuznets, S. (1973), “Modern economic growth: Findings and refl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3):247—258.
- Mincer, J. (1962),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A study of labor supply”, in: Universities—National Bureau Committee for Economic Research(ed), *Aspects of Labor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Olivetti, C. & B. Petrongolo(2017),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family policies: Lessons from a century of legislation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1):205—230.
- Solow, R. M. (1985),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2):328—331.

### Claudia Goldin’s Contributions to Research on Gender Gaps in the Labor Market

WU Huali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China)

**Abstract:** Claudia Goldin was awarded the 2023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for he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advanc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labor market outcomes. Through creatively compiling and integrating historical data on the U. S. female labor force, Goldin has, for the first time, depicts the evolution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gender earnings gap over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She has crafted a women-centered economic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changes i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conomic structure, laws, and gender norms into the analysis of labor demand, and incorporates women’s education, childbirth, childrearing, and gender identity into the analysis of labor supply. Her research uncovers the determinants of changes in American women’s labor market behaviors and delves into the deep-rooted causes of gender inequality. Goldin’s work has not only emphasized gender in economic research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but has also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establishing the economics of gender as a mainstream area of economic research.

**Keywords:** Claudia Goldin; History of Female Labor;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Gender Earnings Gap;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责任编辑:李仁贵)

(校对:何伟)